

# 中國知識社群的現代轉變

• 劉創楚

## 一 知識社群歷史地位的喪失

最近兩個世紀，中國知識份子社會角色的最重要轉變是：它由一個有思想自覺、居政治中心地位的社會群體，慢慢變成一個沒有統一意識形態、扮演邊緣角色的社會階層。

即使在西方，知識份子也是進入現代始流行的名詞<sup>①</sup>。但綜合知識份子的西方涵義，則基本上與傳統中國的士無異。余英時拿西方知識份子的界定元素，即知識技能、公共關懷、社會良心，與中國的士以文化思想傳承與創新為志業、事事關心、任重道遠有異曲同工之趣<sup>②</sup>。

如我們取西方社會學對知識份子的定義，則更似中國的士紳社群。韋伯視知識份子為「掌握文化價值、領導文化社區的群體」<sup>③</sup>。柏森思(Talcott Parsons)則逕稱知識份子為「文化專家」，是基於考慮文化多於社會因素的角色<sup>④</sup>。這種以文化角色為

己任，亦正好是中國讀書人(士及士紳)之中心任務。

傳統中國的士，是在政治及社會秩序中佔據中心位置的社群。由兩千年前開始，這群由儒家思想統一起來(但從未組織起來)的讀書人，便扮演了「承上啟下」的角色，發揮着荀子所謂「儒者在本朝則美政，在下位則美俗」的作用。傳統知識份子上則治理國家，下則領導社會，而且是政權與民間的聯絡人，舉足輕重，早已是漢學家的共識<sup>⑤</sup>。

到了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後，知識份子很快地由「四民之首」的地位，降至「臭老九」的邊緣地位，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鬥爭對象。

問題是此巨變如何發生？知識份子的權力地位是怎樣喪失的？漢學家對此尚未有定論，但我們可由有關的中國研究中提煉出三種假設：功能論、衝突論、演化論。茲簡述如下：

(一) 中國知識份子面對現代挑

戰，束手無策。特別是比較中、日兩國在如何適應西方文明方面，成敗至為明顯。西方學者，多從中、日社會及歷史因素入手<sup>⑥</sup>，倒是中國學者自我檢討，認為知識份子決定因素。例如較早提出這個假設的李恩涵<sup>⑦</sup>，便指出十九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，在迎接西方文明挑戰上，遠不如日本知識份子。主要的原因是，較有能力影響朝政的知識份子對問題缺少認知能力，至於對西方較有了解的，則人微言輕，不受重視。總結持此論學者的觀點，是認為知識份子本有機會去保持其傳統權力地位，惜他們無能力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，故此把中心位置斷送了。

(二)知識社群從本身利益立場出發，自毀長城。和功能論視權位為貢獻的報酬不同，衝突論者視利益為巧取豪奪的結果。作為社會群體，知識份子不只是士(文化專家)，而且是官(政治力量)和紳(經濟集團)。在傳統中國，士紳是知識、權力、利益的結合體。一如任何既得利益集團，士紳面對十九世紀變局之反應是：如何持盈保泰，維持本群體利益。

士紳如何達到上述目標呢？陳志讓提出較為簡單的觀點<sup>⑧</sup>：與軍人合作。簡單說，1895年以前的中國是紳軍政權，政局由知識份子主導；以後則是軍紳政權，軍人主導的局面。知識份子為自保而與軍閥狼狽為奸，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，只是延續一些時日始退出政治舞台。

在日本學者市古宙三(Ichiko Chuzo)筆下，士紳處理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變局之手法非常靈活，結果非常成功。作為中國社會的地方權貴，每逢改朝換代之際，士紳必擴大其影響力。晚清亦無例外。清亡前

後，士紳面對三大危機，但每次均能用靈活合縱連橫手法，化險為夷，甚至擴大權力。第一次危機是1898年之維新運動，其教育改革矛頭對準士紳之合法權威基礎(科舉考試)，故士紳為自保而勾結滿族保守派，壓下改革。第二次是1905年，由清廷宣布取消科舉，士紳轉而連結立憲派，力求盡可能保留特權。第三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，士紳搖身一變成為革命領袖，從而攫取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。問題只在於，這樣左搖右擺，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均可為士紳維持中心位置，但此次例外。因為亡清之新因素是西力東來，欲亡中國。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所以士紳聰明反被聰明誤，終於在1949年喪失一切<sup>⑨</sup>。

(三)面對千年變局，知識份子手足無措，自我否定。余英時認為百多年來知識份子邊緣化是一個複雜的發展歷程，不只是指其在政治影響力消退一端<sup>⑩</sup>。首先是「士大夫文化」的消亡，知識份子淡忘了文化中心任務之餘，還要攻擊士大夫心態，甘心情願地居於邊緣地位。在政治舞台上，余英時的假設是：在知識份子退出中心走向邊緣的同時，另一邊緣人集團，他稱為「光棍」，進佔中心位置。光棍得勢不饒人，把知識份子趕盡殺絕，不只奪取其政治權力，且鏟除其依附的社會資源。但知識份子之最後邊緣化還靠自己：在文化陣線上向西方舉手投降。「文化專家」否定自身的文化知識，這可視為中國知識份子的徹底自我否定。

就在上述的知識份子由中心角色轉變為邊緣角色的歷程中，知識份子系統亦起了量和質的雙重演變。此演變結果將決定知識份子的新社會角色和功能。

日本學者市古宙三認為，士紳處理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變局之手法非常靈活，結果非常成功。作為中國社會的地方權貴，每逢改朝換代之際，士紳必擴大其影響力。

## 二 知識社群結構的 現代變遷

對清代及以前的知識份子作數量研究的學者有張仲禮及何炳棣等<sup>①</sup>；而汪一駒所著之《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：留學生與近代中國（1872-1949）》，雖以留學生為中心，實兼及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世紀中近一百年間中國知識界的變遷<sup>②</sup>。下面我們將勾劃1949年至今大陸知識份子系統的變化。

為作定量分析，研究者只好為知識份子下明確的定義。汪一駒界定知識份子為「中國的士，指受過教育者」。本文對知識份子的定義，則指具備大學文化程度的人，相當於汪所說的「高等」知識份子。依此定義，下面首先要解答的問題是：目前大陸有多少知識份子？他們在那裏生活？他們年紀有多大？他們從事何種行業，幹甚麼工作？他們是如何製造的（受甚麼教育）？而這系統將怎樣演變？

時至今日，大陸的知識份子仍屬人口中的極端少數派。這是數量分析的第一個結論。

依照上述「具備大學文化程度即屬知識份子」的定義，目前大陸的知識份子共有 1,789 萬人，佔總人口的 1.5%。此比例之小，可由歷史及比較角度而知。以清末人口最高峰之十九世紀上半葉言，張仲禮估計士的總數（包括生員和監生）在 110 萬至 140 萬之間，約人口的 0.3%—0.4%<sup>③</sup>。至於橫向比較，可用 25 歲及以上人口的大學生比例為指標：美國（1981 年數字）是 32%，日本（1990 年數字）為 21%，均遠高於大陸（1990 年數字）的 2%：大陸此指標比印度（1981 年數字是 2.5%）還要低<sup>④</sup>。

此略低於 1,800 萬知識份子的數字是這樣估計得出的：大陸 1990 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發現，人口中有大學本科程度的 614 萬，大學專科程度的 962 萬，內含在校生 280 萬。1991 年度至今三個學年大學共招生 213 萬，故有接近 1,800 萬具大學教育程度（包括在校）的人口<sup>⑤</sup>。

就空間分布言，此比例不大的知識份子群集中居住於城市。就用 1990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，全大陸有 614 萬大學本科生（包括畢業及肄業），僅北京、天津、上海三市已佔 122 萬或 20%！從另一角度：全國在業人口中只有 430 萬大學生，上述三市已佔 80 萬或 19%<sup>⑥</sup>！

「高等」知識份子集中於大城市，因而造成了與居於農村——人口中 70%—80%——的群眾疏遠的局面，汪一駒所研究之時期（至 1949 年前之八十多年）已經如此。中共革命已經歷了 45 年，局面依然未有真正的改變。

知識份子集中於大城市，實和他們從事的工作有密切關係。從表 1 可

目前，中國知識份子主要從事於三大行業：文教、工業、黨政。這些行業基本上是以城市為基地的。以鄉村為基地的行業和職業，幾乎得不到知識份子的服務。

表 1 中國知識份子的行業（1990）（單位：萬人）

| 行 業 | 在業人口   | 大專程度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農 林 | 46,759 | 23    |
| 工 業 | 8,658  | 296   |
| 地 質 | 80     | 10    |
| 建 築 | 1,164  | 48    |
| 交 郵 | 1,175  | 28    |
| 商 業 | 2,577  | 58    |
| 服 務 | 619    | 20    |
| 衛 生 | 517    | 75    |
| 文 教 | 1,510  | 347   |
| 科 技 | 145    | 60    |
| 金 融 | 213    | 25    |
| 黨 政 | 1,295  | 222   |
| 其 他 | 12     | 1     |
| 總 計 | 64,724 | 1,213 |

資料來源：國家統計局：《中國統計年鑒，1993》（北京：中國統計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 90。

表2 中國知識份子的職業(1990) (單位: 萬人)

| 職 業  | 在業人口   | 大專程度 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專業人士 | 3,439  | 749   |
| 黨政官員 | 1,133  | 223   |
| 辦事人員 | 1,128  | 138   |
| 經商人員 | 1,947  | 23    |
| 服務人員 | 1,551  | 5     |
| 農民副業 | 45,682 | 5     |
| 產業工人 | 9,813  | 66    |
| 其他工人 | 32     | 3     |
| 總 計  | 64,725 | 1,212 |

資料來源: 同表1, 頁90。

表3 中國知識份子的年齡(1990) (單位: 萬人)

| 年齡部目  | 大學本科 | 大學專科 | 總 數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15-24 | 189  | 235  | 424   |
| 25-34 | 156  | 333  | 489   |
| 35-44 | 66   | 219  | 285   |
| 45-54 | 132  | 110  | 242   |
| 55-64 | 52   | 51   | 103   |
| 65-   | 19   | 14   | 33    |
| 總 計   | 614  | 962  | 1,576 |

資料來源: 同表1, 頁89。

表4 中國知識份子的組成(高等學校分科畢業生)

| 分 科 | 1992年 |         | 1952年  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    | 排名    | 人數      | 排名          |
| 工 科 | 1     | 207,007 | 1           |
| 師 範 | 2     | 179,343 | 4           |
| 財 經 | 3     | 65,749  | 2           |
| 醫 藥 | 4     | 45,664  | 5           |
| 農 林 | 5     | 30,389  | 3           |
| 文 科 | 6     | 28,674  | 7           |
| 理 科 | 7     | 25,877  | 6           |
| 政 法 | 8     | 12,404  | 8           |
| 體 藝 | 9     | 9,116   | 9           |
| 總 數 |       | 604,223 | 人數 = 32,002 |

資料來源: 同表1, 頁719。

知, 知識份子主要從事於三大行業: 文教、工業、黨政。全國就業人口中只有1,200萬知識份子, 從事此三行業者已達860萬人(逾71%)!

表2是知識份子的職業分布。同樣的, 他們集中於三大職業: 專業人士、黨政企單位負責人及機關的辦事人員。以此為業的知識份子合共1,108萬, 佔就業知識份子的九成! 這些行業及這類工作, 基本上是以城市為基地的。以鄉村為基地的行業和職業, 幾乎得不到知識份子的服務。

表3為第四次人口普查所發現的知識份子年紀分布。此表最怵目驚心的便是大陸中年知識份子的「斷層現象」: 由35-44歲年齡群之大學本科生顯著減少。文化大革命開始之1966年, 正是現在40、50歲人士讀大學的年紀。而文革的「停學鬧革命」鬧了十年, 是造成這個知識斷層的原因。此年齡群上下兩個部目, 也受若干程度的影響, 多少從表3能看出來。

表4是當代大陸知識份子的專業背境之縮影。如果以排名1-5為一組, 排名6-9為一組, 我們發現了一個40年不變的事實: 年復一年, 八成以上的知識份子是由工科、師範、財經、醫藥、農林科之專業訓練出來的。但年復一年, 過半數的大專畢業生進入文教與行政的職業。高等教育結構(知識份子的形成)及社會職業結構(知識份子之應用)的矛盾, 始終存在, 未見解決。

總結上述數量分析, 有關知識份子的結構變遷可得兩點清楚的觀察。首先是由其所受教育言, 多元化的系統已經形成。這是自新學校制度出現90年來所造成的結果。此變化有三大特質: 一是由規範知識向應用知識轉

移，工科成為第一熱門，40年不變：二是知識份子的組成，直接由教育制度決定，大學設甚麼系便培養甚麼人材：三是從畢業生的分科，很明顯地見到中共高教的「人力取向」(manpower orientation)：既非傳統之重文，亦非本世紀上半葉的重理，而是重視專業。

教育變遷可以決定知識份子的訓練，卻甚難影響知識的使用。大學畢業生做甚麼工作，主要由社會的職業結構決定。社會分工愈細，知識份子的職業結構愈分化。而由表5可見，社會職業結構的變遷最後會反過來影響教育制度，令其培養多些需求較殷切的知識份子。正如表5所示，注重經濟建設之後13年，培養的知識份子量已較前29年多了幾近一倍。而且，一些新熱門科系增幅特大：財經增三倍半，政法增兩倍，師範也增近兩倍。而這趨勢將持續下去，即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會繼續沿職業結構分化下去。

### 三 職業分化與專業地位的出現

中共於1949年取得大陸政權後，立刻掀起規模龐大、持續不斷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變革，知識份子每每成為運動的對象。上節所述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階層，就是在此「不斷革命」的歷程中形成的。本節將先剖析此社會變遷的基本性質，然後探討它對知識份子角色之意義。

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有一基本矛盾，至今尚未解決。一方面它為着經濟建設的目標，視知識份子為「策略資源」(F.H. Harbison 之語，即高質

素之人力資源也)，亟思加以利用：但另一方面，它為着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，又把知識份子看作「變革障礙」。在每個「社會主義高潮」裏面，知識份子均首當其衝，成為主要的鬥爭對象。

在中共領導人的主觀意識裏面，此矛盾並非不能解決。早於1942年，毛澤東便於「延安文藝座談會」上，要求知識份子改變階級立場。他以自己的心路歷程為榜樣，要求知識份子「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，來一番改造」<sup>①</sup>。他希望知識份子變化感情，自我改造之後，可以「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」，成為無產階級的「有力武器」。但毛並不肯等待知識份子慢慢自我改造。上述的良好願望甫說完，他便掀起大規模的整風運動。終毛一生，以改造知識份子為目標的政治運動層出不窮，反右(1956-1957)及文革(1966-1976)只是其犖犖大者而已。

格理德 (J.B. Grieder) 分析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知識份子，將其分成兩類：一是「新文化」知識份子，以自

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有一基本矛盾。一方面它為着經濟建設的目標，視知識份子為「策略資源」；但另一方面，它為着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，又把知識份子看作「變革障礙」。

表5 當代知識份子系統之形成  
(高等分科畢業生：1949-1992)

(單位：萬人)

| 分 科 | 1949-1978 | 1979-1992 | 合計(1949-1992)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工 科 | 107       | 180       | 287           |
| 師 範 | 64        | 179       | 243           |
| 財 經 | 10        | 46        | 56            |
| 醫 藥 | 38        | 45        | 83            |
| 農 林 | 27        | 34        | 61            |
| 文 科 | 19        | 34        | 53            |
| 理 科 | 22        | 30        | 52            |
| 政 法 | 3         | 9         | 12            |
| 體 藝 | 5         | 8         | 13            |
| 總 計 | 295       | 565       | 860           |

資料來源：同表1，頁720。

由主義為信仰，懷疑階級鬥爭及群眾革命的觀念，肯定個人價值，肯定知識份子於社會變遷之重要角色。另一類是「社會革命」派，在思想上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精英價值，肯定群眾，並視知識份子為群眾革命的助手，只能出力，無權參與設計革命大業或決定革命方向<sup>18</sup>。毛澤東顯然比他的「社會革命」同志更進一步，不只是道不同不相與謀，而是接連發起社會運動，把「新文化」知識份子（幾乎等同絕大多數1949年前畢業的知識份子）改造成「社會革命」的同路人。

反右派運動一役，戴帽被打成「右派份子」的知識份子逾50萬人，幾為1957年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的四分之一<sup>19</sup>！老知識份子（一部分1949年後培養的也受反右牽連）如不於此役全軍覆沒，剩下來的也過不了文革一關。從打擊面之廣及打擊力之大來看，夏爾賓(Nina Halpern)視反右及文革為中共知識份子政策之「干擾」，並進而以為只是利用知識份子政策的兩大「間斷」的觀點，顯然是不符歷史事實的<sup>20</sup>。

較接近事實的說法是：毛澤東時期(1967年以前)的知識份子政策着重改造，鄧小平時期(1977年以後)則較

重利用。政策固然有影響，但能否成功地吧知識份子的力量用於現代化建設，還須看社會結構的變遷是否配合。

上面分析中共知識份子政策兩個目標之內在衝突：改造打擊了知識者的士氣，妨礙了利用；而要利用，便須給予知識者一定的角色和自由，這又反過來影響到改造的工作。儘管如此，兩個矛盾的要求又始終和中共決策者糾纏不清。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，只在於毛以階級鬥爭為治國綱領，對知識階層強調改造；鄧則改用經濟建設為方針，較重視對知識份子的利用。除了政策變化之外，經濟結構的改變也要求更多的科技管理專業人材，以滿足一個日益分化的社會需求。

表6顯示大陸社會結構之總變遷方向：非農就業人口增加，令社會的職業結構由單元化向多元化改變。此表之驚人事實是，「非農化」(也即現代化之基本性質)之結構變遷主要是從70年代開始，至最近十餘年急速進行。1971年之前，幾乎膠着不變，其後二十年，大陸增加了二億多勞動人口，其中幾有二億是轉進非農產業的。二十年間，經濟三產業的勞力比例，由8:1:1變成6:2:2，無論

大陸社會結構之總變遷方向是非農就業人口增加，令社會的職業結構由單元化向多元化改變。而「非農化」之結構變遷主要是從70年代開始，至最近十餘年急速進行。

表6 大陸經濟結構變遷(就業人口)

(單位：%)

| 產業類型     | 1952  | 1961  | 1971  | 1981  | 1991  |
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產業(農林) | 83.5  | 77.1  | 79.6  | 68.1  | 59.8  |
| 第二產業(製造) | 7.4   | 11.0  | 11.1  | 18.4  | 21.4  |
| 第三產業(服務) | 9.1   | 11.9  | 9.3   | 13.5  | 18.9  |
| 總數       | 100.0 | 100.0 | 100.0 | 100.0 | 100.0 |
| 就業人口(百萬) | 207.3 | 255.9 | 356.2 | 437.3 | 583.6 |

資料來源：國家統計局：《中國統計年鑒，1992》(北京：中國統計出版社，1992)，頁101。

是絕對規模還是相對比例，都是驚人的。

由於我們這裏徵引的是官方資料，1991年的數字尚未能反映大陸職業結構之深刻變化。從數字上看，這一年從事第一產業的仍有近六成的就業人口，約有三億五千萬人。但事實上，真正從事農林工作的遠少於此數。一方面，大陸的十五億畝耕地，絕對容納不下三億半農民；而另一方面，農林的非薄收入也留不下這些勞動力。進工廠當工人，到城市做（農）民工，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，「離地運動」正靜悄悄地進行着，這令大陸的社會，起着急劇的結構革命。

但論對知識份子角色的影響，近年的靜默結構革命，則遠比50、60年代的喧騰政治運動大。從土地改革至反右運動至文化革命，連場的鬥爭只成功地把知識份子的「文化專家」權威打砸粉碎。改造數以百萬計知識份子的願望，遠遠談不上實現。最近十餘年變化則朝相反方向，人數急增的知識階層正在形成，工業及服務行業的發展也擴大了知識份子的出路，不再集中在黨政機關行政部門。政策上有利用知識的願望，客觀上也有專業知識用武之地。慢慢地，由「文化專家」地位撤退下來的大陸知識份子，正在佔領各色各樣的社會功能位置。

#### 四 知識社群的多元化發展

本文從探索士這個傳統知識份子群體在近代社會激變下的適應開始，描述它作為文化專家的中心地位逐漸喪失。清末取消科舉，動搖了它的權威合法基礎。民初的軍閥戰爭、日本侵華戰爭及內戰，兵事連綿不斷，剝

奪了知識份子的政治影響力。但它承受最沉重打擊是在中共政權成立後。

土地改革沒收了知識份子的土地及其他經濟資源：反右運動否定了知識份子的最後角色，取締了他運用知識服務社會的機會。至文化革命，連番鬥爭已剝落知識份子最後的尊嚴，唾面自乾，徹底「改造」，令兩千年居於社會核心位置的中國知識份子全面「邊緣化」，徹底自我否定。

但就在此急風驟雨的社會革命籠罩之下，大陸的社會結構卻起着兩種同時出現的靜默革命：一個接受高等教育及專業訓練的知識階層的興起，以及一個日漸分化與專業分工的職業結構的出現。本文詳細分析了此兩個現象，為新興的知識份子社會階層及正在冒起的多元化職業結構畫了像，目標在於用事實指出中國社會的重要變化：知識份子在喪失其文化專家地位之際，也正在取得針對社會功能而服務的專業人員之新角色。

這個變化的重要性是：士這群傳統知識份子，在傳統中國社會最大的貢獻是其整合功能。中國所以不會四分五裂，甚至治多亂少，知識份子的角色舉足輕重。由於傳統社會性質上屬於涂爾幹(Emile Durkheim)所稱的機械團結(mechanical solidarity)，故士藉文化專家的定位來為社會做整合的工作，着重以文化設計及社會安排為其核心的責任。目前，正在步入現代社會的中國，社會的性質正朝涂氏所謂「有機團結」(organic solidarity)進發，整合已不能單靠文化工具。在此社會格局下，知識份子如仍思貢獻於社會整合，則如柏森思所指出的，先須作內部多元化(pluralism)<sup>②</sup>，內防思想之僵化，外化為專業人員，寄身於正在現代社會如雨後春筍般出

當前大陸的社會結構正起着兩種同時出現的靜默革命：一個接受高等教育及專業訓練的知識階層的興起，以及一個日漸分化與專業分工的職業結構的出現。

現的專業群體(professional groups)之中。如上所述，大陸的知識份子正是朝此方向變化着。

### 註釋

- ① Thomas Molnar: *The Decline of the Intellectuals* (New York: The World Publishing Co., 1961), p. 7.
- ② 余英時:《士與中國文化》(上海:人民出版社, 1984), 頁1-2。
- ③ H.H. Gerth & C. Wright Mills eds.: *From Max Weber*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46), p. 17.
- ④ ② Talcott Parsons: "The Intellectual: A Social Role Category", in Philip Rieff ed.: *On Intellectuals* (New York: Doubleday, 1969), pp. 3-24; 23.
- ⑤ 士紳功能研究, 詳見張仲禮(C.L. Chang)的專著: *The Chinese Gentry: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the 19th-Century Chinese Society* (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55)。士紳社群的傳統位置, 參考Franz Schurmann: "Chinese Society", *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* (New York: MacMillan, 1968), pp. 408-25.
- ⑥ Marion Levy, Jr.: "Contrasting Facto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", *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*, 2 (1963):161-197.
- ⑦ 李恩涵:〈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比較〉, 載於李恩涵及張朋園編:《近代中國: 知識份子與自強運動》(台北: 食貨出版社, 1977), 頁1-38。
- ⑧ 陳志讓:《軍紳政權: 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》(香港: 三聯書店, 1979)。
- ⑨ Chuzo Ichiko: "The Role of the Gentry: An Hypothesis", in Mary C. Wright ed.: *China in Revolution: The First Phase*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68), pp. 297-317.

⑩ 余英時:〈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〉,《二十一世紀》, 1991年8月總第6期(香港中文大學·中國文化研究所), 頁15-25。

⑪ P.T. Ho: *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62). 另參註⑤張仲禮作品。

⑫ 汪一駒著, 梅寅生譯:《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: 留學生與近代中國(1872-1949)》(台北: 楓城出版社, 1978)。

⑬ 見註⑤張仲禮, 頁109-11。

⑭⑮⑯ 國家統計局:《中國統計年鑒, 1993》(北京: 中國統計出版社, 1993), 頁925; 89; 85-86。

⑰ 毛澤東:《毛澤東選集》, 第三卷(1969), 頁808。

⑱ Jerome B. Grieder: *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, A Narrative History* (New York: The Free Press, 1981), p. 283.

⑲ 根據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, 大陸具大學文化程度人口有288萬。由1957起, 七年內的大學畢業生約80萬, 故估計1957年的知識份子人數為200萬。見國家統計局:《中國社會統計資料, 1987》(北京: 中國統計出版社, 1987), 頁125。

⑳ Nina Halpern: "Economists and Economic Policy-Making in the Early 1960s", in Merle Goldman ed.: *China'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: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7), pp. 45-63.

劉創楚 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,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高級講師。著有《工業社會學》(1988)及《中國社會》(1990與楊慶堃教授合著)等書。